

泗水华人取名与身份认同

BUDI KURNIAWAN

Prodi Sastra Tionghoa, Universitas Kristen Petra, Siwalankerto 121-131

Surabaya, Jawa Timur 60236, Indonesia

Email: budi.kurniawan@petra.ac.id

摘要

华人取名的习俗有悠久的历史。姓名是华人身份的其中一个特征。然而，印尼华人在新秩序统治时期，排华的情况逼他们改名，使用印尼文名字。新秩序时期结束后，印尼华人又得到了表达中华文化的渠道。在不断改革的今天的印尼，华人的身份也受了影响，不断地在变。因此，本论文将通过探讨印尼华人取名，描述新秩序后印尼华人的身份认同。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其华人居民不少。因此本论文采用焦点小组讨论的方式来收集泗水华人对中文和印尼文姓名的观点，并分析起名与表现自己身份认同的关系。

关键词

取名，印尼华人，身份认同

Abstrak

Praktik penamaan Tionghoa memiliki sejarah yang sangat panjang. Nama merupakan salah satu penanda identitas Tionghoa. Namun, pada masa Orde Baru, situasi yang diskriminatif memaksa orang Tionghoa untuk berganti nama menjadi nama Indonesia. Pasca Orde Baru, orang Tionghoa di Indonesia mendapatkan kembali sarana untuk mengekspresikan budaya Tionghoa. Di dalam reformasi Indonesia yang terus bergulir, identitas Tionghoa juga dipengaruhi olehnya, terus-menerus mengalami perubahan. Maka, makalah ini hendak membahas praktik penamaan orang Tionghoa, untuk menjelaskan identitas orang Tionghoa di Indonesia pasca Orde Baru. Surabaya sebagai kota terbesar kedua di Indonesia, juga memiliki tidak sedikit warga Tionghoa. Penelitian ini menggunakan metode *Focus Group Discussion* untuk mengumpulkan pandangan orang Tionghoa di Surabaya terhadap nama Tionghoa dan nama Indonesianya, dan dianalisis untuk memaknai hubungan antara identitas dan penamaan.

Kata Kunci

Penamaan, Indonesia-Tionghoa, Identitas

引言

1998年苏哈托政权的垮台，为印尼带来了改革之风，华人的社会地位重新获得肯定。这些变化激发了研究印尼华人的热忱，以社会、经济、文化等新视角探讨印尼华人的多方面问题。其中，印尼华人的身份认同是值得研究的一题。研究华人的身份认同很重要，首先是因为身份认同是研究印尼华人的第一扇门，把这门揭开了，我们才能理解印尼华人的各方面。其次，身份认同不是固定的，它是一种“生产”，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历史与文化下的结果 (Hall, 1996: 4)。再次，印尼华人本身不是同质的群体，因此其身份认同复杂多样。如今，新客华人 (totok) 与土生华人 (peranakan) 的分化已不明显，也并不能代表他们的身份认同了 (Hoon, 2012: xxxix)。

姓名是华人生活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父母为孩子取名，包含着他们对孩子的希望 (Blum, 1997; Zheng, 2006)。但印尼华人的取名有很独特的历史，因在苏哈托统治时期，曾经发生逼着他们改名的情况

(Suryadinata, 2010: 220)。因此，印尼华人的改名与取名问题很复杂，与印尼的宗教、社会和政治等方面有关。不过在这些因素背后，看来每位华人都有自己选名的理由。通过这些选择，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印尼华人身份认同如何表现出来。

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有不少华人居民。因此，本研究想通过泗水华人入手，分析华人取名的观点，更全面地理解华人的身份认同。

华人取名

按照程(2000)，华人的姓氏制度有几个特点：（一）它是氏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又是宗法制度的表现，历史渊源悠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姓氏制度之一。（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它与封建礼制相结合，标榜同姓同宗。（三）它虽然以汉族原有的姓氏为主体，但是也吸收和容纳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 (2000: 48)。

现代华人给自己或后辈取名要考虑到几个方面。最基本的，也是一般人的普通心理，就是取字雅音美、含义丰富的名字 (杨, 1999: 3)。一般情况下，父母会选择那些表示文雅、善良、温柔、美好的字眼用于女孩子之名；选择那些表示强壮、勇猛、有为的字眼为男孩子取名。而姓名用字常被合起来表示某种美好的含义，比如：万里、康庄、天翼等 (1999: 4)。某个时代的特点也给中国人取名带来了影响。比如：周朝的时候，命名要按照一些规定，不能以国名、官名、山川、隐疾、畜牲、器帛等命名；春秋战国以后，以贱、丑命名；汉代时，因国立强大，人们常用“安国”、“延年”、“延寿”等为名 (程, 2000: 58)；1948年以前，常常会有“平安”、“德宝”、“发财”等这些名字；1949-1950年，常出现“解放”、“建国”等名字。一直到现在，某个时代阶段的特点会影响中国人取名，反映了思想观念的变化 (杨, 1999: 6)。

身份认同

传统上，认同被认定是一致的、固定的，是个人所具有的本质，如种族、性别、阶级等性质所产生的“身分”。但在二十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认同是“建构的事实”，是在不断化成 (becoming) 过程中建构出来的。霍尔对认同提出了两种观点。第一个观点强调同一性，说文化认同是一汇集的真实自我概念，这个概念隐藏在和自己同样背景的大多数的人身上，人们有相同的历史记忆，也互有血统上的关系。文化认同在于人们有共同的历史经验、文化符码，这两点提供我们“为人”更坚定的不变方向，这也是我们生长过程中不会被间断的附注和意义。纵使历史不断演进改变，我们还是在意识上有统一的共识 (Hall, 1990: 223)。另外一个观点说，除了这些同一性，认同也通过差异性形成的，也就是说，在历史层面上刻划下“我们已经成为怎样的我们”。认同是通过历史、文化与权力的相互交叉，不断地构建出来。认同是以缝合处或是识别形成的。文化认同的重点不在于它自己本身的本质，而是在于它是在哪个位置上的陈述 (Hall, 1990: 225)。

研究方式

本研究使用定性研究法，以小组座谈的方式为主。采用定性法是因为本研究主要是想从研究对象（印尼华人）的角度来揭示生活现象的意义 (Creswell, 2009)。研究者将每位研究对象的反映录下来，成为本研究的资料。

采访对象是9位泗水华人。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具有关于自己姓名的一些问题与经验。他们有些于新秩序时期改名了，也有些在改名以后还遇到官方歧视性的对待，在官僚方面也遭受到种种困难。有些采访对象没经历过改名过程，自己决定不改名，还有些自己决定改名。这都符合Bloor (2001)提出关于采访对象的准则。小组座谈将能为我们提供对象对某种现象的规范意义、过程及理解。

座谈录像被抄写成稿子后，研究者进行编码，从资料里找出一些主题，并依据主题把内容归类与分析。以下是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华人姓名的重要性

所有被采访者，尤其是年老的，都认为姓非常重要，是姓名的主要组成部分。姓体现了华人的祖先所在，意味着华人的历史。他们认为华人总要记住先祖。另外，他们也为自己的姓氏感到自豪，对家族的祖先表示尊重。所以，他们提倡“饮水思源”，华人不得忘记自己的根，不可以随便更改自己的姓名。“坐不改名，立不改姓”。

“华人姓名，其实最重要是姓，不是名。……因为姓让我们一直记住祖先。华人是“饮水思源”，总记得祖先，重视姓名、历史、我们的根。……这是华人取名的意义所在。”

“如果姓都没有了，改成印尼文名字，中文姓名也没有，你会变成谁呢？谁的孩子？……姓名是华人的骄傲，若没有……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因此我们华人很重视姓名，永远不忘祖先。”

这种老一辈华人对姓的观点，若用Hall (1990)的理论来分析，这观点是属于HALL思考文化认同的第一种模式，文化认同可以说是一汇集的真实自我概念，这个概念隐藏在和自己同样背景的大多数的人身上，人们有相同的历史记忆 (1990: 223)。这同一的中华性，必须寻回，当成群体的同一身份。姓氏表示他们身为华裔，使他们进行一种“想象中的寻找，为破碎的认同感带来了想象的同一” (1990: 231)。

华人取名的习俗

在小组座谈里，能看得出来，长辈更了解取名的习俗。后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比不上长辈。在这方面，他们之间有相当的距离。比如，关于辈分字派的了解。传统取名习俗要把辈分体现在人名中。辈分表示对祖先的一种尊重，也意味着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自豪。除了辈分这问题，被采访者也提到“族谱”，又是一种对祖先的敬佩与尊重。

与以上文献相似，被采访者自己的取名过程也要考虑到一些意义，尤其是父母对儿女的希望，往往会寄托在儿女的名字里。比如有位被采访者与姐妹们名字中都包涵“花”这词类的成分。

关于华人取印尼文名字的方式，更复杂多样。不过在年轻华人当中，中华传统习俗与全球化概念已经混合在一起了。因此年轻华人最近大多数喜欢为儿女取西方名字。但无论是长辈还是后辈，他们通过姓名其实也进行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从中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以差异来定自己的身份认同）。

从华人姓名的重要性以及取名的习俗，我们可以知道印尼华人确实具有多样的身份认同。他们对“中华性”有不同的看法与理解。至少这儿看得出来的是长辈与后辈有不同的“中华性”。这符合Tong (2010)所说，华人认同具有差异性，其中是因为世代的不同 (2010: 134)。

华人对政府提议改名的看法

华人对政府提倡改名的政策有不同的看法。这儿又出现长辈与后辈的不同。长辈往往把这政策视为“压迫”，并批评为不公平，有歧视性的政策。而年轻一代的华人态度比较中性。虽然这改名规定不是必须的，但大部分被采访者都改名了。其理由是情况的逼迫。当他们面对政府官僚办手续等，就会感到担忧，因为用中文名会带来麻烦，而用印尼文名办事会更顺利。

“为什么 KWIK KIAN GIE 还用中文名字，而我们改成印尼文名字？这是因为情况。那时候听说若要坐飞机，用中文名就无法办手续。可是改成印尼文名字后，办得就很顺利。还有别的例子，都是因为情况逼我们改名。”

而且即使他们都改名了，有时候还会遇到麻烦。这样的情况往往会发生于，政府还把他们中文姓放在印尼文名字里。这样的政策看起来是很矛盾的。他们已经心甘情愿地把姓名改成印尼文名了，而最后政府还是把中文姓加入到新的名字里。这导致他们官方文件上的姓名都很乱。

“奇怪的是，我的名字已经改为 C L，但我身份证上加了中文姓，变成 K C L。我丈夫名字已改为 L J，但现在怎么变成 L J L Q M。这导致我们不能出国，因为护照上的姓名与机票上写的不一样。所以很麻烦。一些官方文件同样会有这样的问题。真让我头疼，麻烦死了。”

年轻一代的华人态度较为中性的，甚至有的还以自己的意愿改名字。这表示在印尼华人后辈当中，已经有了对身份认同概念的变化。他们姓名与尊重祖先的关系已不太密切了。不过我们也不能说后辈已经排斥中华传统文化，只不过他们现在考虑姓名的因素更多样化，不再与祖先关联得那么强。从一位被采访者能看得出这一点。他自己决定不改他的中文名字。其理由是因为对自己的姓名已经习惯了。再加上，政府规定

要把姓放在新的名字里，这对他来说带来了不便。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不改。再说，他认为国籍与个体姓名的选择是两回事，并无关联。

“所以如果我把名字改成 JAMES, JAMES S 或者 S JAMES，不是 JAMES BOND 而是 JAMES S。对我来说，也对我哥来说，是很可笑……用印尼文名字，但里边有中文姓。……后来我们再考虑，其实这姓名从我们出生一直伴着我们，都没发生过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决定不改了。我们是印尼公民，为印尼奉献。……我们的原则是，姓名和国籍是两回事。”

新秩序政府的华人改名政策是印尼华人历史方面构建身份认同的因素之一。据被采访者，此政策具有歧视性，政策的实行也很矛盾（还要把中文姓放在印尼文名字里）。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新秩序的同化政策很明显地不成功，具有矛盾性，因为新秩序反而还要把中华性显示出来，这是为了要把华人群体与别的族群分离开来，给予各民族之间很明显的边界 (Chua, 2004: 472-473)。另外，同化政策不成功因为对于长辈来说，他们的中华性，尽管他们都改名了，也无法被删掉。

没经历过“被逼”改名过程的年轻一代华人，不太在乎有歧视性的官僚。中文姓名不是被视为很要紧，而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取决于更经常使用的印尼文名字。

华人对目前姓名的看法

虽然长辈华人认为新秩序逼他们改名，但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接受。这是因为国籍的因素。因他们现在都是印尼籍，所以不得不承认并接受自己的印尼文名字。据王赓武在 Tan (2008) 里边所说，华人身份认同是以四种规范：物理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范与文化规范，构建的，就是按照这些规范带来的压力，华人就靠着哪方面显示他们的身份认同 (2008: 163-164)。在这改名政策里，显然是政治规范逼了他们显示国籍认同。不过其实在一些华人心里，他们还认为中文姓名更方便，不像印尼文名字那样复杂。这再次强调长辈的中华性还是构建于中华文化的根源。

“关于姓名，因为已经30多年一直用印尼文名字，我想已经没问题了，我可以接受。其实在华人群体当中都知道并叫我的中文姓名。在印尼，一般孩子都有基督教名字，比如刚才说的 JAMES 或 JOHNNY 或其他。我想，好啦，人也可以有两个名字。虽然我刚才说华人应该“坐不改名，立不改姓”，但目前情况已变成这样了，我们也没办法。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印尼文名字，叫我印尼文名字，我都接受了。”

“其实中文名更方便，比如 KQL, LHX, QSQ。印尼文名字很复杂，比如，里边要不要加某某字，用 OE 还是 U，等等。”

其他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华人改名的方式，也就是说怎样取印尼文名字。研究发现，方式多样。不过有些长辈，在那段紧张的时间里，选印尼文名字看来比较随便，没有一定和足够的考虑。比如：在电话簿里找名字、别人给的等等，而且大部分都不敢把中文名字成分放在新的名字里。

“我的印尼文名字，政府逼我改的名字，我只是在电话簿找的。我随便找一个听起来舒服，W（一个印尼文名字）。这看起来像是个有地位的人，然后再找后边的，最后找到了，合在一起。我没想过要把中文名字翻译成印尼文，完全没有。”

而在晚辈当中，改名的时候就考虑得更充分。比如他们考虑到宗教方面，名字要带宗教色彩。

“父母给我中文名字，我自己改成希伯来文。我找希伯来名字 M，是圣经里的一个人物。意义是上帝帮助，与我的中文名字意义差不多。所以我就用 M 这名字。”

姓名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里，按照场合和交流的对方，华人选用印尼文名字或中文姓名。有的场合更适合使用中文姓名，因为与他们交流的人都更熟悉他们的中文姓名。在别的场合里，当人们更熟悉印尼文名字，他们就使用印尼文名字。这表示印尼华人身份认同的混合性。身份认同顺着不同的场合，会不断地变化。

“……我们要看周围的人。如果在印尼人群体里我们用外语名字，对他们来说很陌生，对我们来说也很别扭。为什么别扭？就像我的名字 **W Z C**，不是所有人能叫得出来，有时候他们会把它倒过来。所以还是用 **S**（印尼文名字）更接近主流人群，大家也都能说得出来。……我们在印尼生活，虽然有时候很辛苦，但为了不辛苦，我们还是要能接受。”

“但是认识我的人都不叫我 **C L**（印尼文名字）。我教中文的时候使用 **K Q L**（中文名字），别人叫我 **Q L** 老师。若在银行，别人叫我 **Bu C**（印尼文名字），有时候 **Bu T**（印尼文名字简称）。”

被采访者都有统一的观点，就是现在华人不用再担心，可以很自由地使用中文姓名。这是一种对多元文化的肯定与赞同。其实即使他们用了印尼文名字，也不能隐藏他们华人的外表。有了印尼文名字并不代表他们是纯印尼人，他们还觉得自己还会被视为“他者”。后辈同样也认为可以通过姓名显示他们是华人，但这观点更偏重于华人族群是印尼国家多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是偏于华人该通过姓名尊重祖先。

“……我们也不用害怕，在印尼我们本来不是原住民。关于名字，显示我们的中文名字也没关系了。”

“名字不需要隐藏着，就算了。我们也不需要后悔，名字虽已经改了，都是自己的名字，我们该为名字自豪。我是华裔，算了，你们也是印度裔、阿拉伯裔、马都拉裔，……现在我们都是印尼公民，我们都要感恩，已经被承认为印尼公民其中的华族。”

结论

通过小组座谈，我们得到了泗水华人对姓名的多样观点。姓名，不管是中文还印尼文的，都与身份认同有密切的关系。目前华人取名，考虑到很多方面，也带了一些现代与全球化色彩。中文姓名对长辈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标志，而对后辈，中文姓名一般不是中华认同的唯一标志了。长辈与后辈认同感的不同，是 **Hall (1990)** 提出的 1.相似性和连续性；2.相异性和破碎性 两种关系来思考认同的一种表现。首先它带给我们一些过往经验的连续性基础，另一部份则是告知我们关于深刻的不连续点的经验 (**1990: 227**)。印尼华人认同也以这两种轴构建的。

按照霍尔的观点，认同是一种不断化成的过程。通过小组座谈里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已经经历了新秩序时期排华的华人，会变成今天怎样的华人。新秩序歧视性的政策，以分化了华人长辈与晚辈的中华性，分化了他们的认同。

小组座谈里也能看得出长辈对后辈的一种“使命”，就是让年轻华人不要忘记自己文化的根。或者用 **Hoon (2012)** 的话来说，这是“文化使命”，想要把年轻人“再变成华人”。不过从小组座谈里的对话，其实长辈并不一定是逼晚辈，而更偏向一种“谈判”。这通过长辈能接受晚辈采用有西方色彩的名字。

本论文描述的结果是初步分析的。因此，还有很多地方须更深入一步地去分析，比如，可以进行较仔细的分析命名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参考文献

- Bloor, M. (2001). *Focus Groups in Social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Blum, S. D. (1997). Naming practices and the power of words in China. *Language in Society*, 26(03), 357-379.
 程, 裕祯. (2000). *Zhōngguó wénhuà yàoluè* (中国文化要略). *Běijīng: Wàiyǔ jiàoxué yǔ yánjiū chūbǎnshè*.

- Chua, C. (2004). Defining Indonesian Chineseness Under the New Ord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4(4), 465-479.
- Creswell, J. W. (2009).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SAGE Publications.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Hall, S. (1996). Who Needs 'Identity'? In S. Hall & P. d. Gay (Eds.), *Questions on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Hoon, C. Y. (2012). Identitas Tionghoa Pasca Suharto: Budaya, Politik dan Media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
- Suryadinata, L. (2010). *Etnis Tionghoa dan Nasionalisme Indonesia*. Jakarta: Penerbit Buku Kompas.
- Tan, M. G. (2008). *Etnis Tionghoa di Indonesia: kumpulan tulisan*: Yayasan Obor Indonesia.
- Tong, C. K. (2010). *Ident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Springer.
- Zheng, Y. (2006). *Naming China: From live righteously and small orchids to construct China: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Chinese naming practice*. Singapo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ming in Asia.
- 杨, 德峰. (1999). 汉语与文化交际 (Vol. 14): 北京大学出版社.